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Paradigm Lost

逝去的范式 ——反思国家理论

[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 彼得·布拉提斯◆著

李 中◆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Paradigm Lost

逝去的范式

——反思国家理论

[美] 史丹利·阿若诺威兹 彼得·布拉提斯 ◆ 著
李 中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去的范式:反思国家理论/(美)史丹利著;李中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78-2

I. ①逝…

II. ①史… ②李…

III. ①国家理论

IV. ①D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51 号

逝去的范式

著 者:(美)史丹利·阿若诺威兹 彼得·布拉提斯 译 者:李 中

责任编辑:丁 昊 孙建军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19 字数:263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78-2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年实录》（10 卷）、《北大哲学门》（10 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 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 卷）、《楚辞源流选集》（5 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 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 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 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 本）、《绿色经典文库》（16 本）、《大美译丛》（8 本）、《支点丛书》（10 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 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 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 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 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

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 10 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 60 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 60 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 30 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 20 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 80 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 80 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 80 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 年 9 月 28 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序 言

国家的力量，世界的力量

史丹利·阿若诺威兹和彼得·布拉提斯

真正逝去的事物是不会死而复生的，只有被错误所掩盖的事物才有重见天日的可能。从弗洛伊德的《图腾与禁忌》，到斯蒂芬·金的《宠物坟场》，错误的掩盖只能带来死亡的假象，不会造成真正的灭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家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已经成为被错误掩埋的牺牲品，学院派内外游移的保守观点埋葬了它们；面对全球化和地区化的咄咄攻势，对国家存在的杞人忧天之情埋葬了它们；左派们研究重心的转移埋葬了它们；它们不再是“政治力量”，只是一股股由无差别的分散现象产生的更为分散的力量：从福柯（Foucault）与哈贝马斯（Habermas）到德勒兹（Deleuze）与加塔利（Guattari）。

本书所摘选的各篇文章都是旨在帮助国家理论重新焕发活力，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着三大主题：向读者介绍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基本知识，评估一下当前各种政治现象和理论潮流与国家理论之间的关联程度，以及找出制约国家理论发展的瓶颈。所有这三个主题都将依托拉尔夫·米利班德和尼克·普兰查斯的研究成果进行展开。之所以会选中米利班德与普兰查斯不仅仅因为他们二位是国家理论方面的顶尖学者，更因为许多后来陆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都是由他们的那场争论引发的。因此，了解了米、普二人的观点及其优缺点就能更好地从广义上理解马克



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优势与劣势。

在本书的简介中我们要明确一下后面即将讨论的一些问题，以便于读者从理论和实践出发更好地理解书中内容。重点将放在通过对国家理论与其竞争理论在各个方面上的比较，以找出它们之间的区别。同时还将阐明在面临全球化与地区化的双重压力下，国体的改变与国家理论适应性之间的联系，以及涉及到国家机构影响力的相关问题。

国家理论的具体内容

从本书摘录的文章，特别是巴罗（Barrow）和潘尼奇（Panitch）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 20 世纪 70 年代，国家理论还是颇受重视的。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关注它，就连社会科学范畴内其他主流学派的学者也对它青睐有加。国家理论只用了短短数年的时间便迅速形成，并且极有可能在多元文化构成的环境中脱颖而出，成为重要的主流学派。同时理论本身也成为政治科学和政治社会学中一个结构化的多功能系统化的、理论。1985 年，《国家回归》（Br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的出版，为它提供了一个假想的平台，使国家重新成为社会科学调查中的一个普通对象。自此，米利班德、奥菲（Offe）、布拉克（Block）、瑟伯恩（Therborn）和普兰查斯等理论家淡出一线。这种变化出现得非常突然，因为它既缺乏酝酿时间又没有群众基础，而且至今也未找到合理的解释。此后国家理论就一直处于尴尬的状态，它从不曾真正成为一个实际的对象，也没有因遭受猛烈、持久的批判而被彻底颠覆，更没有人找到其它理论取而代之。^①以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用评论阿尔都赛学派（the Althusserian school）逐渐衰落的言语来形容这种状况是最恰当不过的，“它越来越像一颗饱受创伤的心灵，只有靠迅速地遗忘和深深地掩埋才能得到慰藉；这是理论健忘症的一个有效实例”。

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争最先吸引人们注意的是一个与此相关且同样充满矛盾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者们为此所作的论著中，我们发现了

两种反复出现且彼此间还相互冲突的论述。一方面，这场争议在学术上颇有意义。它吸引了学术界的关注，即使不能说是全部，但至少可以说是大部分与国家理论相关或相悖的观点及框架结构都是在这时期形成的；另一方面，平心而论这场争论并未产生深得国家理论精髓的深邃思想，但它成功地塑造了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的形象，一举奠定了他们在国家理论研究中的核心地位。究其实质，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争论呢？难以想象，会有那么多知识广博，思维活跃的专家学者为了一个缺乏实质内容的反方观点而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讨一个原本微不足道的说法。对此，我们的回答是虽然它没有明确的主题（比如专门讨论一下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组成），但其意义依然十分明确，因为这场争论可以看做是列宁-卢森堡之争的重复和延续。米利班德是“工具主义”国家理论的代表人物，他强调的是资产阶级通过其政治组织掌控国家，这与列宁的观点相悖。列宁的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必要工具，他们以此来维护自己的组织体系。同理，革命党若能攫取政权，那么工具主义对权力的定义是否同样适用？普兰查斯提倡的则是“结构主义”国家理论，他认为国家是资产阶级优势的结晶，它起到了瓦解工人阶级的作用。同为“结构主义”国家理论，卢森堡的观点更温和一些，她主张国家机关是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职能的体现，它是应对自发性工人阶级运动必不可少的屏障，所谓的工人运动则指游离于国家及组织层次中正常法律逻辑以外的行为。

国家理论与政治策略间的联系或许会成为它的“致命伤”。正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初推动国家理论形成的原因往往会成为最终毁灭掉它的原因。从表面上看，二者间的这种联系只不过是各种政治运动对国家理论的关注而已，从更深一层考虑，可以把这种联系视作国家理论可能带来的问题在战略上的表现。在多个政党共享政治权利的阶级社会中，会有多种系统理论或行为主义供人们遵循，它们支撑着多元化社会的发展。以国家为中心，新自由主义等新思潮认为政治权力并不是社会基础，相反，政治权力是从社会中游离出来的独立存在。所有版本的国家理论



都把研究重点聚集在如何解释社会基础及政治力量所带来的决定性影响上。以往在政治分析中常用的“统治地位”和“阶级对抗”等字眼，如今变成了“国家能力”和“冲突解决”。

我们的观点是虽然国家理论的流行程度已经有所下降，但由它引发的某些问题的重要性却在不断上升。正如列奥·潘尼奇在他的笔记中所述，国家理论的降温与阶级斗争的缓解和政治环境的改善有直接联系。^②由于近20年来鲜少发生自下而上的激进改革，整个政治气候和学术思潮都发生了转变，国家理论及其支持者变得曲高和寡。了解国家理论消沉的原因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相反的角度来理解现状，还能对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更深入的剖析。因此尽管其学术地位几起几落却始终不曾从人们的思想中彻底消亡。随着政策的技术化程度不断加大，及其表现方式的不断提升，政治分析的结果也变得越来中立公允。当金融政策和社会福利这些公开的政治问题被转换为与金融货币政策有关的技术问题——利率和债务管理后，与其息息相关的联邦储备系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世界银行、欧盟等组织的重要性就变得空前高涨。这种政治组织活动激增的现象可能是自由贸易带来的产物，也可能是合法授权产生的后果^③。在社会机构表现出越来越多政治行为的环境下，国家理论中某些疑难问题的解决变得迫在眉睫，因为国家理论不仅可以揭示国家与社会利益及职能间的关系，它还是预测统治阶级未来阶级斗争趋势的有力工具。

国家理论的沉沦不仅使其本身成为政治的分支流派，同时也导致了人们在社会探索方面观念上的倒退。为此我们试图在两个有关的领域——社会制度和全球化的研究中重新引入国家理论，相信它会给研究工作带来莫大的助力。当然，这也是本书选文时所围绕的重点。从中读者们可以看到干扰国家理论发展的多方因素，例如当代人们所推崇的全球化带来的争论，国家自治地位的下降，以及以国家为中心论武断地认为自己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制度，从而克服了社会中心论的片面之处等等。这些都是国家理论发展道路上的障碍。我们试图以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内格里 (Antonio Negri) 出版的《帝国》(2000 年) 为契机向您展示, 在新形势下国家理论是如何改变自身以适应目前的政治变革, 同时也阐明了当下的主流理论虽然应该拨冗存简, 但仍有必要重温一下米利班得和普兰查斯等人的深入分析及其战略意义, 以期对国家理论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全球化、制度与国家力量的兴衰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的今天, 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多种理论纷至沓来的窘境。从威廉·格雷德 (William Greider) 对跨国公司向全球各个角落伸出触角的新闻报道, 到哈特和内格里精密细致的理论推断都揭示出如今世上的一切事务已经不由自主地卷入其中了。大家达成共识, 资本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 旧有的调节制度和以民族划分国家的方法已经部分或全部不适用了。某些学者如克劳兹·奥佛 (Claus Offe, 1985) 以及斯科特·拉什 (Scott Lash) 和约翰·厄里 (John Urry, 1987) 号召人们把精力放在对未来的预测上, 希望能预知调整的终极目标和洲际对抗的新形势, 然而实际上 20 世纪 90 年代大多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还是与全球化有关的研究, 学术界坚信全球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经济特别是政治空间所做的彻底的重新配置。自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 具体时间似乎颇有争议,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政治和经济上获取权力, 他们用低价倾销的手段不断地侵蚀其它民族国家的主权, 彻底颠覆了民主。那时的资本主义四处找寻生产资料和市场, 以便于他们进行资本输出, 而旧有的民族国家也不甘心拱手让出既得利益, 二者之间的资本对抗形成了旧有的排列顺序, 虽然今天仍能依稀看到当年残存的痕迹, 但它已再无往昔的气势。继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之后, 哈特和内格里 (2000 年) 再次采用了“地域分解”和“地域重组”的概念来描述过往的变迁。随着介绍全球化的文献越来越普及, 与上述主题相关的观念也被清晰地勾勒出来了, 相关的学术作品更是从四面八方不



断涌现，层出不穷。

主题似乎正在沿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国家构筑了貌似“条纹”状的社会时空，意即权力既集中又分散，整个社会体系分成不同的层次，每一层都有自己的支配空间。因此在他们的思想中物质生产可以先分散下放到地球上遥远的各个角落上，然后再进行资源重组，重新把成品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德勒兹与法国精神分析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他们那思想深邃影响悠远的不朽巨著《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用关于国家与政治机构的理论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写道：“我们被迫把国家看做一个自在永有的客观存在，它极端完美又极端完善……国家的真正起源可能要回溯到最古老的人类社会。”在人类社会漫长的进步之旅中找寻国家成立的准确时间是非常困难的，大抵应该在“所谓”的原始社会初期到古代社会之间的某个时期吧。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仍以强迫性劳动为主要生产力。然而德勒兹与加塔利则坚持认为那是一种由氏族成员共享财产的氏族社会。也因在那些古人的脑海中根本不会产生阶级的概念，当然更不会知晓阶级斗争为何物。在他们看来国家只是贮存生产力的仓库，所有形式的生产力包括知识，尤其是基于长期的集体生产实践而总结出来的科学技术理应归为集体也就是国家所有。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多数人达成的共识就是国家的意志，是绝对应该服从的事情”。国家和它的所谓科学就一直打着这个幌子去攫取凌驾于社会空间和社会思潮之上的绝对权力，毫不顾忌这是否会妨碍社会和知识的进步及更替。如果说以绝对权力为核心的摩尔（Molar）政治是国家政治的一个特定形态，那么我们需要给这种可以超越时空的权力一个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它定义为“平滑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各种政体就像不同类型的分子一样自由自在地游荡着，在游荡中产生的国家权力此时不仅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形式，它还是权力间彼此竞争的结果。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这番描述套用一句政治术语来讲就是一部无政府主义的宣言。

这番言论中的潜台词其实还包括了对于领土的定义，它是社会权力

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另一个代名词。因此，政治斗争是为了争取国家权利，但它的终极目标并不会像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信仰的那样会在将来建立起一个消除了国家概念的大同世界。后继者列维·施特劳斯（Levi Strauss）和皮埃尔·科拉特雷斯（Pierre Clastres）同样放弃了国家是人类社会进步产物的说法，也拒绝了国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产物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国家本身是一个专政工具，一方通过革命攫取了国家的权力后就会不断酝酿催生出下一次关于国家权力的革命，从而产生另一个专政政权，如此往复而已。

哈特和内格里引入了帝国的概念，并把它当做地域重组的最新形式。他们争辩说，从某种程度上讲由跨国公司建成的网络已经逐渐占据上风，大有取代旧有的按民族划分国家的趋势。目前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就是凭借这种优势才获取了比其他国家更为庞大的权力。帝国的本质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国际性组织，国家的主权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人权、长治久安的利益，以及其他自由民主的传统观点都可以高于国家主权。不过要想建立一个合法的新秩序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光考虑帝国的利益是不够的，更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为了确保帝国的经济和政治能处于稳定状态，甚至不惜要借助司法的力量。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努力的方式可能各不相同，但最终总离不开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相结合的传统模式。如果旧有的国家主权仍然残留一定的势力，并且妨碍我们控制各种力量建立新秩序，那么哈特和内格里会肯定地告诉你，别担心，这只是黎明前暂时的黑暗，全球化帝国的建立是大势所趋，其结果定不会因此而稍有改动。伴随着民族国家的灭亡，一个全新的国际化的“新生儿”即将在阵痛中诞生。

民族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带有镇压功能的强制性力量，在执政者的意识形态中，这种权力被定义为可以凌驾于他们心目中的“老百姓”之上的霸权，他们的任务只是努力维持霸权崇高的地位。在一个完整的主权国家内，公民只有依靠工会和政党组织的阶级运动才能体现出他们的职责和权力；然而在帝国所带来的新形势下，劳动者和社会主义者攻



击的对象——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却凭空消失了，或者说主动放弃了它们对权力的主张。以往的经验证明这很容易导致过去支撑着民族国家的相互制衡的力量变得分崩离析。哈特和内格里反复强调全球化给工人阶级的组织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立场坚定的工会会员日益减少，罢工制裁等手段的威慑力在不断削弱，结果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正常被迫向新自由主义或自由贸易主义低头（虽然英联邦的工党政府作了多方努力试图挽回颓势，但收效甚微）。即使目前仍处于执政状态的政党也不得不臣服于帝国的强大压力之下。更有甚者，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所带来的差不多是唯一的好处，国家福利制度的处境也岌岌可危。在工会势力单薄的国家（如美国），福利制度正逐渐被取消；工人阶级团结度较高的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其福利制度也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纯粹靠出卖劳力而生存的劳工人数正在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新兴的信息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已初步显现。用内格里的话来讲，罗伯特·莱克（Robert Reich）等人建立的标志性分析术语“产业”工人现在已经变为“社会化”工人，在他的最新论著中，已经无法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对现在的知性劳工做出泾渭分明的行业划分并进行管理，因为一个合格的员工已不再拘泥于某个狭小的天地，而是对整个社会的分工和流程都有着一定的认知能力。按安德烈·高兹（Andre Gorz）提出的老观点来分析，无论新兴的脑力劳动者还是旧有的体力劳动者，都是资本榨取剩余价值的对象，但实际上新旧二者所追求的目标却不尽相同。传统的工人阶级借工人运动以改善自身的境况，他们是为获取应得的待遇而奋斗，新兴的社会化员工则在努力争取能体现个人价值的舞台。目标虽然变了，但斗争的激烈程度却丝毫没有减弱。例如 2000 年的波音工潮就有 16,000 名工程师参加了罢工行动，他们要求按自己的进度来完成自己的工作，反对资方为增加产值加大压榨力度的作法，进而粉碎了资方将知识劳工降为产业工人使用的卑劣手段。

根据哈特和内格里的观点：帝国的出现已经彻底打破了旧有的对立

关系，原有的政治挂帅的思想早已行将就木，处在新旧更迭期间的我们不但能看到旧时代的终结，还能迎来足以替代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新形式国家。德勒兹和加塔里在《千高原》中指出由国家事务构成的摩尔政治产生分裂后，各种事务在强大的去中心化压力下按其各自的级别分散在对应的社会空间中形成新的组群。他们的观点也给长期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挑战，这一另类的思想在立体几何模式下似乎有些解释不通，但若放在流体模式中却屡试不爽：自然界中不仅有重力还有流体，新出现的游离状态与原有的国家机构之间形成了对峙。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和次年的意大利总罢工“火热的秋天”给哈特和内格里带来了不小的启发，让他们的观点变得不再激进。德勒兹和加塔里则强烈指责共产党没有在“五月风暴”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把这归咎于马克思主义在政治上过于拘泥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所致。马克思主义擅长搞自下而上的革命却不擅于进行自上而下的管理，这种治国方式显然并非王道。因此哈特和内格里继承了福柯的衣钵，认为权力的分散无处不在，并极力打造出新的空间并把各种权力分配其中。按照他们的思路，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无产阶级作为政治对象已经没有存在的意义了。他们断言在日益削弱的劳工运动和全球化的资本之间可作为缓冲的区域已经越来越小，并终将完全消失于无形。在帝国时代，站在帝国对立面的是广大的“人民群众”，这些被排斥在帝国边缘并受到帝国压迫的人群和庞大的资本形成了新的对峙。此时“群众”与帝国间的“直接对抗”成为社会活动的典型特征。

普兰查斯在他的著作《国家、权力和社会主义》中挑战了上述分析赖以生存的基础，他认为站在国家主权对立面的并不是游离的存在，而是西方社会古老相传的有中心没边界的空间理念：

西方古典时代所定义的空间中有一个中心：城邦（城邦本身也有中心：广场）。但在当代人的思维中，这个空间是一个开放式的概念，它就像一个没有边界的同心圆一样不停地向外扩



展，却又永无尽头。中心（城邦和广场）生存在一个没有差别没有等级的空间中，该空间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均衡性和对称性……在这个由欧几里德（Euclid）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eans）描述出的空间中人们无需为改变自己的地位而努力，他们的移动改变的只是自己的位置。终点和起点在实质上是沒有差别的，因为每一个点都只是前一个点的复制而已；同理每一个新建的侨居地也不过是雅典或罗马的复制品（普兰查斯 1978，101）。

普兰查斯理论的重要性在于它很好地理顺了政治空间的定义起源和历史沿革，同时把现代的领土主权论看做是在古典理论基础上派生出的新产物，而非与之相对立的客观存在。普兰查斯认为，德勒兹和加塔利（还有哈特和内格里）的错误根源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被迫分出等级的劳动者和日常生活可以对空间历史性造成极为重大的影响。^④在古代社会，甚至是部分封建社会中根本没有国域疆界这些概念，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中的各个阶级不是存在于多个独立的社会空间中，而是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更为稳定的社会形态。在资本的力量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使劳动阶级产生分化之前，人们各司其业稳定地生活着，他们没有迁居都市重塑自己的要求，没有移民美国追求幸福生活的渴望，更没有参加马戏团四处流浪的愿望。在这个尚未建立起国界的空间中，“虽有各种势力在一连串的扭曲和弯转中不断交替更迭、相互影响，然社会阶级始终保持固有的状态，生活在下层的人们只能遵照所属领主或君主的意志被动地进行着自上而下的变革”（普兰查斯 1978，103）。此时游离于该社会制度之外的存在还只是镜花水月，空间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同的，一切运动都是无法带来任何变化的徒劳之举，即使人们有了逃逸的念头也缺乏必要的空间。

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国家的生产（再生产）能力及其对领土和疆界的划分和占有变得重要起来。